



親密伴侶暴力，為何而戰？ 探討親密伴侶暴力服務的現狀

馬宗潔、曾靜儀、王海玲、胡雅瓊

壹、前言：親密伴侶暴力是槍林彈雨的戰場

親密伴侶暴力領域是一個充滿爭議與衝突的領域，尤其是在「暴力」的定義與解讀。所衍伸出處遇方式，以及性別對等的議題上，處處都是戰場。這個領域中充斥著嘈雜混亂的聲音，若沒有不斷地提出疑問，面對疑惑的好奇，很容易從槍林彈雨中退陣下來。

2012 年，Linda Mills 領軍，以「修復式司法」為武器，企圖攻佔臺灣親密伴侶暴力的處遇方式，於是，贊成與反對聲音在修復式司法的疆土中英夾雜地開火，煙硝味瀰漫到所有的政府與民間團體，Mills 似乎也將她在美國戰場的沒用完的槍砲，跨過太平洋繼續使用。從最初的性別之爭，到現在的主流與邊緣女性主義的對立；從是否可從事夫妻治療延續到修復式司法，戰場從社會福利打到司法系統，這樣的戰爭已經延續三十年，似乎沒有停止的意思。在這個領域，一旦有立場就會陷入戰局；然而，若立場不清，則無指引工作的方向。

看著荊棘叢生的戰場，已無往日榮景。不禁低頭懷疑，究竟誰才是我們的敵人？我們為誰而戰？為了機構生存而戰？為了自己的位置而戰？還是親密伴侶暴力下的受害者而戰？手持武器處於備戰狀態的我們，捍衛的是什麼？我們相信的立場，究竟立基於何？到底親密關係的現狀是什麼？

貳、旗幟鮮明的運動背景，隱晦爭議的文獻

「親密關係伴侶暴力」（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，簡稱 IPV）。若以美國歷史論之，IPV 源自 1980 年代的受暴婦女運動（battered women movement，簡稱 BWM），最初是提供給受性侵害者的庇護所，卻發現需要被庇護的多是帶著孩子的受婚姻暴力的婦女，這些婦女無處可去。社會運動的特色是由下而上，出發點是改變社會現狀，發起者對於所要改變的目標立場鮮明。當時的邊緣團體，就是目前被標籤的「主流女性主義者」，所倡導的概念為：「暴力是權力控制」，「暴

力是性別議題」，也企圖將婚姻暴力從家庭內的關係議題，提升成為社會問題。並於 1994 年代推動了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（註 1）（簡稱 VAWA）。於是，親密伴侶暴力不再是家務事，被視作犯罪行為。體制外的社會運動，一旦立法，變身為體制內的制度，夾帶著政府的強制力介入，如強制逮捕，本來企圖改變社會價值觀的社會運動，又建立出一套體制下的困境，於是企圖改變的聲音又紛紛響起。

反觀國內的家庭暴力防治法，起源於 1993 年鄧如雯殺夫案，1995 年 9 月，法官高鳳仙參照美國、澳洲、紐西蘭等國家庭暴力法規與文獻，完成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草案。而後由數個婦女團體一起參與推動（註 2）。相對地，國內的立法歷程，時間上更有效率，但社會運動於改變社會觀念的蘊育過程，似乎發酵的時間不夠長。也許目前國內 IPV 的一些困境與美國類似，但不同的立法程序，反映出不同的社會背景與信念。

不論時間長短，以社會運動起家的社會服務，最初所接觸的對象，所受的暴力都相當嚴重，一旦運動變成體制，所服務的對象範圍變大，類型也變多，挑戰了社會運動最初始的信念，從事 IPV 的工作者，若無機會了解完整的歷史背景，易在信念上不斷地拉扯，常處於困惑中，困惑於名稱的界定、定義的不明確、統計數字的不一致、以及理論的分歧。這也反映在文獻上，不同立場的人永遠在劍拔弩張的情境中，蠢動的火藥味總是伺機而動。

在 1995 年，作者之一還是留美的博士生時，第一次接觸到親密伴侶議題，就充滿得

困惑。第一個困惑是當時的名稱為 domestic violence（簡稱 DV），到底 domestic 是什麼？是住在一個屋簷下的人們？還是有某種關係的人？兒童虐待算嗎？中文應該如何譯翻譯才到位？在美國，DV 雖也是受爭議的名稱，近十年相關專業有共識，從官方到民間，已經普遍使用 IPV 取代 DV。國內早年將 DV 翻譯成「家庭暴力」或「婚姻暴力」，然而，「家庭暴力」涵蓋範圍太廣，所有家庭成員都可以納入；「婚姻暴力」又過窄，侷限於婚姻關係中。於是，漸以「親密伴侶暴力」取代了「家庭暴力」或「婚姻暴力」。雖然目前名詞上爭議不大，但只有專業與學術領域使用此一名詞，一般民眾並無此認知，且政府的網站，與民間社福機構服務簡介內容，仍然以「家庭暴力」與「婚姻暴力」為主題。受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範，國內親密伴侶定義以配偶、前配偶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為主，其中包括了同性伴侶。美國官方 IPV 定義中，尚包括了非同居男女朋友（註 3）。然而，美國沒有通報制度，卻有強力執行的強制逮捕制度。2012 年，國內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修法，社福單位企圖將非同居男女朋友納入家暴防治對象，並未通過。若將非同居男女朋友納入家暴防治對象，會增加社會系統的通報量；也挑戰了民法「家庭（註 4）」的定義，是法界人士反對的主要理由。

作學生時，發現美國文獻對於 DV 的盛行率數字，有很大的差距。當時念的第一篇文獻，就提到 DV 的盛行率是 70-90%，為什麼差距這麼大？這是第二個困惑是，難道統計數字不該是一個固定數字，如出生率，死

亡率一般？深入研究後，發現 DV 統計受資料來源，以及暴力的定義所影響。美國沒有通報制度，當時也還沒有強制逮捕制度，統計數字來源可能是醫院、警察局、社福機構、或庇護中心。每一個單位所接觸到的親密伴侶類型不同，所受傷害的嚴重類型不同，數字的差距很大，DV 的數據，就像一團迷霧。這些駭人聽聞的數據，不斷地強調女性是主要受害者，同時也會好奇，男人也會受害嗎？數量到底多少？男人受害事不願是接受服務？還是沒有危險到需要服務？

至於暴力的定義，是第三個困惑，早期受 DV 訓練，對於暴力的解釋是權力控制，性別就是權力。當時印象最深刻的話是：「如果你男朋友覺得你穿得不好看，要你回家換衣服，你會不會換？」九零年代受 DV 訓時，以女性主義為「權力控制」為主要論述。當年非常清楚地傳授婚姻暴力是性別議題，是父權下的產物，暴力是權力與控制。雖在接受訓練時也是半信半疑，因為相信暴力與愛不會並存，掙扎與徘徊在與親密關係與性別自主中，但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磨練，透過閱讀，討論，實務分享，做研究，與婦女接觸等管道，不斷地自問自答澄清自己的疑惑，理解到 IPV 的複雜面向。個人的困惑，這麼多年來，也慢慢解答了這些困惑，了解到，在親密關係中，雙方都希望可以影響對方。權力的定義是有意圖的去影響別人，可以影響的他人的方式有很多種，施展暴力的人，不一定是權力感 (powerful) 良好的人，卻是無權力感 (powerless) 者所用最拙劣的手法。暴力是流動的所以很難定義，親密伴侶暴力的層次很多，無法用單一的角度定義之，有

些暴力行為是出於控制，有些暴力行為是宣示主權，有些暴力行為則是出於害怕。而暴力既是手段，也是結果，是企圖讓人處在別無選擇，不得被影響的恐懼中，而失去了自我。

同時，也發現資深的實務工作者有一套了然於心卻不可言喻的理論，許多年輕資淺者如作者早年的歷程，在困頓中摸索，在許多的碩士論文中可以窺見。這個困頓若沒有機會釐清，找不到定位，往往是社會工作者折損的主要原因。這些困頓許多人都體會過。然而，這些困惑不單是個人的內在困惑，其實是反映出這個領域的困頓。從 IPV 相關研究中，發現不同立場的學者，也持續地用學術語言呈現出這此領域的爭論。在 IPV 於學術領域中，以下簡述最常爭議的三個面向：

一、暴力的定義

但到底什麼是暴力，肢體以外，語言與精神暴力是否是暴力？如果是，暴力無所不在，誰都可能是加害人。暴力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感受？肢體暴力有外在客觀事實為證，較無困難定義；至於精神暴力，語言暴力呢？主觀感受部分，是不舒服就算暴力，還是感受到恐懼才算？

二、暴力的成因

近年來，IPV 百家爭鳴，尤其是以 Linda Mills 以「關係」論述暴力，她對於所謂的主流女性主義所倡導的「權力控制」有甚多批判。Mills 認為暴力是關係下的產物，一個巴掌拍不響，雙方都需要為暴力負責任，推動「修復式司法」為主要工作模式。以「權控」

為角度論述暴力，則認為不論任何人，都不該被暴力。暴力是犯罪行為，非婚姻衝突，暴力是加害人的選擇，而非被激怒下的行為。加害人應該負暴力的全責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從事婚姻治療，受害者會因恐懼而協商，因而負擔加害人的暴力負責。不同論述，關係著對於暴力的解釋，責任的歸屬，以及處遇的方向等。

三、IPV 是否性別對等

「性別對等」(gender symmetry)親密伴侶暴力的另一個爭點。性別對等意旨男人和女人於親密伴侶暴力數據上是相當的。性別對等議題，在美國已經辯論了三十年，雙方以各自的立場論述。然而，蒐集親密伴侶暴力的確實統計數據，有一定的困難。有些研究將精神虐待、口語暴力、與肢體暴力皆定義為暴力，不但將統計數字拉高，也增加辨識暴力程度的困難性。有些研究簡單地訪問受訪者是否遭受過暴力，卻忽略瞭解暴力所發生的特定時間、頻率、以及發生的脈絡，如動機、暴力的後果、或是誰先動手。如此，發生一次輕微暴力事件和多次嚴重事件，有相同的研究結果。相關研究數量雖多，但在暴力定義上紛歧，使爭議聚焦的困難性提高。從數據檢視性別對等的論述，往往是去脈絡的論調，忽略了社會結構面的性別議題。

參、戰場的範圍：如何定義暴力決定是否性別對等

若從歷史的觀點，早期婚姻暴力運動者，提出「暴力性別化(註5)」的概念，此

一作法引起許多研究者的反彈，會質疑難道只有女人被打嗎？若將情緒暴力也算入，是否男人一樣的被打？從早期文獻觀之，運動者並沒有否定男性也會被暴力，因為強調暴力是性別化的結果，女性在關係中受暴，問題不只是兩人的關係，而更是社會支持男性對女性使用暴力的結果。然而，一旦在親密關係中被暴力，不論留在關係中或離開關係，不同性別所付出的代價是否相同？再者，男人會被暴力是否同等於男性被暴力的機會與女性一樣？恐嚇殺死對方全家，而使對方乖乖就範，是否也有性別的差異？

親密伴侶暴力的形態的多元性，造成定義的困難。一般婚姻暴力或親密伴侶暴力的教科書，對於親密伴侶暴力的定義採廣義模式，除了身體暴力，還包括情緒，心理，以及性暴力，這些類型的暴力，身體暴力與性暴力比較有判斷客觀標準，而心理與情緒暴力則容易以主觀感受為標準。即使身體暴力有客觀標準，然而，身上的傷，卻也不能說明暴力當下的脈絡，受傷是來自於主動攻擊還是被動防衛？至於心理與情緒暴力，為無形的暴力，難以具體化，有時受害者在暴力當下尚未指認為暴力。一旦心理與情緒暴力被定義為暴力，幾乎所有的親密關係，都可能存在暴力。

從 113 通報量來看，加害人的男女比例約是八比二(註6)，這個數據與似乎並無大爭議。然而，需要更細緻得探討 113 案件的來源。如此寬廣的定義，對是倡導反親密伴侶暴力有一定的意義，可以讓大眾注意到暴力的普遍性，警覺每一個人都可能參與各種類型親密伴侶暴力，親密伴侶暴力不是少數

有問題的關係間才會發生。然而，一旦寬廣定義，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，也可能是加害者，暴力就真是無所不在，對於第一線工作者以及研究統計而言，有一定的困難。

目前第一線工作者，多是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五十條的責任通報，所有相關人員在二十四小時皆有通報的責任，這些有通報責任的人以警察局、113、與醫院為主。對於許多第一線工作者，有時在時間壓力下完成行政責任，比分辨何種行為符合親密伴侶暴力更急迫。本文作者檢視婦女救援基金會通報案件發現，責任通報制並不能說明案件被通報的形式，許多案件是被動通報，許多被通報案件當下沒有身體暴力，可能是大聲爭吵，毀壞家具，被鄰居報警處理，許多人在不知情下主動進入通報系統，警察來了，不論暴力輕重一律通報。即使當事人自行報警或就醫，目的可能只是希望備案，作為日後離婚、爭取監護權、或申請保護令的依據，並沒有期待後續服務介入，通報當下有明確表示不需要後續服務。然而，當事人也不知道因此就被登錄到資料庫中。如此類型的案件，在通報單上，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，可能只有姓名，其他基本資料如年齡、工作、結婚年數等幾乎都沒有，甚至沒有聯絡電話，如此的案件，多當場拒絕後續服務，許多案件是於開案日就結案。

被通報進來的案件，必須追蹤一段時日，在追蹤這些時間內，社會工作者進行後續為追蹤被通報對象，這些案件的基本資料較完整，暴力內容也有簡單描述，這些描述多是第一線工作者所記錄，如警察、醫院、或者 113，卻可能有前後不一致的現象，例

如，通報內容描述平淡，似乎並非嚴重暴力，但在量表上分數卻達到危險值。二線工作者極盡可能的聯絡當事人，當事人也極盡可能的躲避，往往紀錄上，都是工作者與當事人電話聯絡多少次未能與當事人說到話，以及留言訊息。而真正見到面接受服務的案件，可能不到十分之一。然而，接受後續服務的男性受害人是相當低，原因可能有下列，男性不願意接受服務，尤其不願被標榜服務女性的婦女機構所服務。且男性受害人的案件很少有生命危險，多不會被列入服務對象。

若 IPV 所提供的服務侷限於社福單位，可以寬廣定義「暴力」，讓更多人接受服務。若牽涉到司法單位，須該當法律要件。因此，IPV 是否為犯罪行為，成為定義的核心關鍵，故不能從寬認定。社會福利服務與司法介入定義應不同，因進行弱勢處遇及犯罪約制的差異，即不同專業有不同的處理面向，以廣泛定義及單一定義在執行上有不同的困難，與影響不同專業的分工和合作。

一旦暴力定義模糊，統計數字傾向呈現出性別對等。如果以身體暴力定義親密伴侶暴力，無庸置疑的是女性為親密伴侶暴力的主要受害者，多數的女性在身體能力比較弱勢。然而，具有強勢體力並不必然會使用暴力。但若以寬廣親密伴侶暴力的定義，親密伴侶暴力的範圍擴大，不同性別被暴力的機會相當。必須承認，時代改變，親密關係中的不對等位置，性別已不再是唯一原因，男性被暴力的機會增加。社政單位希望透過立法來創導國家對於親密伴侶暴力的重視，社會服務一旦與法律結合，卻被法條綁架，服務內容綁手綁腳，無法伸展。於是，不禁思

考，若只以統計數字爭辯親密伴侶暴力是否對等的意義為何？社會的性別議題在變動中，防制暴力，目標是暴力，非性別。性別議題雖在親密伴侶暴力中佔一席之地，但也非絕對。此一議題牽涉到對於暴力原因的論述，傳統女性主義權力控制論述，似乎已不能解釋所有的親密伴侶暴力案件，新興的論述以「關係」為出發點，似乎對於非危及生命的案件，提供了另一個眼光。此時，不禁讓人好奇，不同理論的觀點對於親密伴侶暴力的意義為何？

肆、看待暴力的眼光決定了使用的武器

多數案子被通報後，拒絕提供資與接受後續服務，個案紀錄中無法了解其暴力行為的內容，即使有些許對於暴力的描述，都是案主主觀描述，可能有誇大或者隱匿，這些描述是否提供足夠的資料判斷該暴力行為是權控。若本著「權力控制」的角度來看待暴力，執行研究時，編碼時所看到的每一個行為都是與控制有關。非權力控制的行為，根本不會被編碼。也就是說，研究者可能帶著權控的立場檢視案件，相信暴力是權控，有時卻不敢明白表示。許多研究者都發現，當 IPV 的研究投稿時，立場有時會決定是否會通過審查。有時兩位審稿人，可能出自不同陣營，對於研究者的立場給了南轅北轍的修改意見，爲了要順利投稿，投稿人可能只好趨向隱晦立場，呈現出看似中立的論述。

於是，又回到親密伴侶暴力的原點，立場問題。每一件親密伴侶暴力，都一定有「關

係」議題，也有「權力控制」議題，關係與權力本來就是親密關係的重要元素，雙方若無關係如何展現權力與控制？二者並不互斥。以親密伴侶暴力最頻繁的理由：「嫉妒」為例，以「關係」角度論之，嫉妒是愛情的重要元素；然而，因嫉妒而對伴侶暴力，使其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是權力控制。不同立場的人，若能細緻論述立場的基礎點，編織出親密伴侶暴力完整的圖像，相信對於身處於暴力的人，是莫大的貢獻。運動路線出發的 IPV 必須旗幟鮮明，學術走向的研究卻似乎要保持中立。作者發現國外研究，雖不標明，卻可以從字裡行間讀出研究者的立場，一旦相信自己是對的，很難包容不同的論述。

國內的研究與福利資源分配關係緊扣，讓許多機構或研究者窒礙難行，表達立場時更爲含蓄。若能針對不同類型暴力，採取不同的處遇，皆能有效終止暴力，才是防止暴力的核心精神。如何避免親密伴侶暴力的爭辯，流入文人相輕，從不同論述中，逃脫暴力無解的困境，以及對於無法制止暴力的無奈。

伍、為誰而戰

重新檢查通報的目的為何，國家有多少資源可以投入。若資源有限，通報目的應限縮為以安全第一修先考慮，資源集中於危險案件，若各類形案件大量湧入通報系統，工作者無法以比例原則在工作，也無法篩檢出最需要服務的案件。若資源足夠服務所有類型案件，不同類型的案件由不同窗口進入，

對於不願意被通報，但願意認真處理親密關係的案件而言，可以減省行政流程，不會覺得被政府騷擾。

Linda Mills 在她的書（註 7）中的結論提到：主流女性主義的權控論述主導親密伴侶暴力的方向三十年了，修復式司法將會在未來三十年有其位置。我同意親密伴侶暴力領域的工作走到一個瓶頸，需要更多的角度檢視之。然而，Linda Mills 這句話的起心動念是相信修復式司法的是有用的，還是想利用

親密伴侶暴力戰場得到自己的歷史位置？

（本文作者：馬宗潔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；曾澥儀為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；王海玲為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；胡雅瓊為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）

關鍵詞：親密伴侶、暴力、修復式司法、性別對等

註釋

註 1：該法案在 2000，2005，2012，2013 年被重新批准。

註 2：資料來源：smland.kcg.gov.tw/ethics/ethics_12.doc

註 3：請參考美國司法部網站 <http://www.justice.gov/>

註 4：民法 1122 條，稱家者，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關係。

註 5：英文為：violence is gendered.

註 6：資料來源：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 <http://dspc.moi.gov.tw/ct.asp?xItem=2971&ctNode=1445&mp=1> 此一數據可能有誤差，因該網站的家庭暴力得性別統計資料，是將所有類型的家庭暴力統一計算，未將親密伴侶暴力或其他類型暴力，如兒童虐待分別計算。

註 7：Mills, L. G. (2008). *Violent Partners: A Breakthrough Plan for Ending the Cycle of Abuse*. Basic Books, NY. p.245-246.

參考文獻

柯麗評，王佩玲，張錦麗等，（2005）。家庭暴力－理論政策與實務。臺北：巨流出版。

Brush, L. D. (2005).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research on women's violence and aggression, *Sex Roles*, 52(11/12), 867-873.

Dalton, B. (2001). Batterer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completion. *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*, 16, 1223-1238.

Dutton, M. A., Goodman, L. A. (2005). Coercion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: Toward a new con-

- ceptualization. *Sex Roles*, 52(11/12), 743-756.
- Hamberger, L. K. (2005). Men's and women's us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linical samples: Toward a gender-sensitive analysis. *Violence and Victims*, 20(2), 131-151.
- Kimmel, M. S. (2002). "Gender symmetry" in domestic violence: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review. *Violence Against Women*, 8(11), 1332-1363.
- McHugh, M. C. (2005). Understanding gender and intimate partner abuse. *Sex Roles*, 52(11/12), 717-724.
- Mills, L. G. (2008). *Violent Partners: A Breakthrough Plan for Ending the Cycle of Abuse*. Basic Books: NY.
- Rennison, C. M. (2001). *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age of victim, 1993-99.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*. Washington DC: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.